

# 踵金宋餘習：蘇天爵《元文類》中的 詩歌史開端探論<sup>\*</sup>

凌頌榮

## 提 要

蘇天爵(1294—1352),字伯修,爲元代中葉館閣文臣的代表人物。其精通史學之餘,亦善於詩文,有總集《元文類》七十卷傳世。《元文類》具備豐富的材料與龐大的規模,以賦體爲始,傳體爲迄,合計收錄34類文體,文學史價值不可忽視。本文擬聚焦於《元文類》的詩歌部分,特別是各個類別的開端部分。蘇天爵固然希望建立元詩的主體性,卻必須處理元詩成形以前,與金、宋兩代詩學交雜的時期。這涉及元代對前朝詩歌與文化的認可與接受。是以本文希望從總集的編選手法入手,探討《元文類》對這問題的態度,以及處理手法。本文將分成三部分。首先是整理有關元詩開端之議題的理路,以及其與《元文類》之性質的關係;其次,本文會由元好問於總集中的位置入手,分析金人詩歌進入《元文類》的情況與意義;最後,本文會關注其他金、宋遺民,嘗試梳理隱於總集中的前朝記憶與遺民情感,並考察蘇天爵如何接受它們。

**關鍵詞：**《元文類》 蘇天爵 元詩 詩歌史 總集

---

\* 本文初稿曾於2021年8月28日,發表於香港公開大學(現名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聯合主辦之“近世文史研究香港青年學者論壇”,並獲與會學者諸多意見。而投稿之際,本文又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的細心閱讀和詳盡指教,因而獲得重要的修改機會。在此一併謹申謝忱。限於篇幅與學力,文中未能盡善處將待日後修正。

## 一、緒 論

蘇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於仁宗延祐年間循國子學出仕,為元代中葉館閣文臣的代表人物。<sup>1</sup> 蘇天爵素以史學聞名中國學術史,編有《國朝名臣事略》和《遼金紀年》等。而在芸芸史著之外,他還編有一部詩文總集——《國朝文類》,即明代以後稱之《元文類》。今本《元文類》七十卷,以賦體為始,傳體為迄,合計收錄 34 類文體。<sup>2</sup> 據其友陳旅(1288—1343)寫於惠宗元統二年(1334)的序,蘇天爵“蒐摭國初至今名人所作”,再憑“聚之積二十年”的努力而成書。<sup>3</sup> 由此即見《元文類》的成書時期與編選範圍。

對比刊行於相同時代的總集,《元文類》材料豐富,規模龐大,可謂難得。清代四庫館臣曾大讚“是編去取精嚴,具有體要,自元興以逮中葉,英華採擷,略備於斯”,並認為無前人資源可憑的它勝於《唐文粹》和《宋文鑑》。<sup>4</sup> 如此把三部總集相題並論,亦代表蘇天爵所編有如另外兩部較早期的總集般,足以反映出特定時代的文章精華。事實上,清人的說法並非原創,而是源自蘇天爵自身的編書動機。陳旅於序文謂:

1 據《元史》所稱,元中葉的文壇“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地位崇高。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183,頁4226—4227。

2 確實的收錄文體順序為:賦、騷、樂章、四言、五言古詩、樂府歌行、七言古詩、雜言、雜體、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詔敕、冊文、制、奏議、表、箋、箴、銘、頌、贊、碑文、論、序、書、說、題跋、雜著、策問、啟、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辭、謚議、行狀、墓誌銘、墓碑、墓表、神道碑、傳。

3 陳旅:《國朝文類序》,蘇天爵編:《元文類》(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5。案:現存的《元文類》分成兩個系統,一是至正二年(1342)西湖書院本,二為翠岩精舍小字密行本,刊刻時期大約早於至正二年。後者的內容並不完整,流傳亦不廣泛,只有個別的刻本傳世。詳細的版本流傳情況,可以參考清人錢泰吉(1791—1863)於《跋元翠巖精舍所刊蘇氏文類》《跋元西湖書院所刊蘇氏文類》《跋校本元文類四刊》和《跋明晉藩刻元文類》的考證。四文見錢泰吉著,昌彼德句讀:《甘泉鄉人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卷4,頁177—190。西湖書院本後為民國人張元濟編為《四部叢刊》影印本。本文考慮到可行性、通行性和文本質素,將以世界書局出版的西湖書院本影印本為原典文本。

4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188,頁1709。

翰林待制趙郡蘇天爵伯修，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魏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國家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沈泯，赫然休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大缺者歟？<sup>5</sup>

除了《唐文粹》和《宋文鑑》之外，他上溯至時代更早的著作，即作爲“總集”概念之源頭與典範的《文選》。<sup>6</sup> 這反映出其雄心之大、理念之深。而無論是研究元代文學抑或總集發展者，亦不當忽視其位置與價值。

可惜，在現今學界，以《元文類》爲主體的研究頗有限。<sup>7</sup> 無怪乎今人周雪根檢討《元文類》的研究趨勢時慨嘆，“直到今天，人們卻很少對它的價值做過探索，幾乎忽略了它在文學發展中的存在”，以之爲學界的重大損失。<sup>8</sup> 較可觀和深入的成果，只有香港學者陳漢文發表於 2015 年的期刊文章《蘇天爵的〈元文類〉與元代中後期的大都文壇》。<sup>9</sup> 此文從史料和藝術角度探析《元文類》的內容，一方面補充古人對其詩選部分的忽略，發挖當中的儒家觀念和美刺傳統，一方面考察蘇天爵所選的文人，分析其身處的大都文人圈子，包括他們面

5 陳旅：《國朝文類序》，蘇天爵編：《元文類》，頁 4—5。

6 唐代的《隋書·經籍志》初次提出“總集類”，並置之於集部的末處，也就是“楚辭”和“別集”兩類之後。在這個“總集類”中，居首的是西晉人摯虞（？—312）的《文章流別集》，次則梁代昭明太子蕭統（501—531）的《文選》。雖然《隋志》的小序明言摯虞所著爲“總集”概念的創始之作，但此書於唐代已告亡佚，其細節早已不爲世人所知；反而《文選》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更加發展成扣連科舉的“文選學”。故於唐以後的人而言，《文選》就是“總集”之源頭與典範，爲總集編者所推崇和仿效。見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卷 35，頁 1089—1090。

7 以《元文類》爲主體的文學研究數量稀少，而且多限於學位論文，例如范先立《蘇天爵〈元文類〉研究》（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8 年）。其他論述則多見於與蘇天爵或元代文學有關的文章。前者如閔盟《論蘇天爵的文學思想》（保定：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4 年）；後者則多見於期刊文章，如穆德全《元代石家莊史學家蘇天爵在歷史文獻學上的貢獻》（《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4 年第 4 期，頁 48—57。）、韓秀利《談元代藏書家及藏書文化》（《東方人文學誌》2009 年第 1 期，頁 81—95。）、和顏智英的《末世孤臣的海戰詩比較析論：文天祥、張煌言》（《海洋文化學刊》2015 年第 18 期，頁 63—109。等），應用程度和焦點俱有不同。可見對比史學範疇，蘇天爵和《元文類》在古典文學方面的討論實爲不足。

8 周雪根：《〈國朝文類〉研究芻議》，《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4 期，頁 81。

9 陳漢文：《蘇天爵的〈元文類〉與元代中後期的大都文壇》，《人文中國學報》第 21 期（2015 年 10 月），頁 291—329。

對的時事,以及出處抉擇等心態等。然而受到“大都文人”的題目所限制,陳氏對《元文類》選詩的考察,大多集中於由虞集(1272—1348)、袁桷(1266—1327)和馬祖常(1279—1338)等組成的骨幹,明顯忽略了一些作品數量較少的詩人,尤其是位處各類開端,時代較早者。

觀《元文類》選錄詩作的部分,部分詩人實具前代遺民的身分,以“元人”稱之頗見疑問,而其詩作甚至影射了蒙元南侵之事。這無疑與《元文類》的立場構成張力。當這些作品因其時代順序而排列於較前的位置時,難免牽涉到蘇天爵如何定義元代詩歌史的開端,並延伸至元代對前朝詩歌與文化的認可與接受。此即本文希望探討的課題。本文將分成三部分。首先是整理有關元詩開端之議題的理路,以及其與《元文類》之性質的關係;其次,本文會由元好問(1190—1257)於總集中的位置入手,分析金人詩歌進入《元文類》的情況與意義;最後,本文會關注其他金、宋遺民,嘗試梳理隱於總集中的前朝記憶與遺民情感,並考察蘇天爵如何接受它們。

## 二、《元文類》的編選原理與“國朝”的概念

蘇天爵以“國朝”為總集的名稱,表明以“元代”的詩文為編選對象,原則看似清晰。但任何以統治者身分為定位的時間座標,其起迄的問題往往有灰色地帶。畢竟歷史與文化的發展是延續的,即使社會上各種場域(Field)存有重疊,彼此互動不定,可見的影響亦非必然及即時的。<sup>10</sup> 意即政治場域(Political Field)的變動不一定同步影響其他場域的運作,也不會直接中止那些場域的能動性(Agency)。就如理學建立於宋代,但入元以後未有停步之餘,更走向前代

10 此處謂之“場域”沿用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Félix Bourdieu)的理論。簡而言之,“場域”就是由行動者(social agents)藉客觀的結構關係(structural relations)組成的社會空間。一個社會上會按不同行動者的位置(space of positions)建立起多重“場域”,而“場域”之間因行動者的身分和活動而產生各類互動,包括合作、競爭等等。見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in Randal Johnson, eds.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pp.29–30.

未有的高峰。蘇天爵本人師從大儒劉因(1249—1293)的弟子安熙(1269—1311),而劉因所宗尚的學術淵源,正是南宋的朱熹(1130—1200)。<sup>11</sup> 換言之,他在學術層面上也是宋代程朱理學的傳承者,與其“元代文臣”的政治身分並存。可知從宋代到元代,儒門理學於教育場域(Educational Field)、文化場域(Cultural Field)的位置都未有因為政權更替而遭遇重大轉折。總集作為詩文載體,為文學場域(Literary Field)的產物,而指導後學為文作詩的價值,則又涉及教育場域的應用。隨著眾多場域的彙集與重疊,各者内部的脈絡難免會產生分歧,以政權為斷代標準的方式不能直接套用於詩文發展的模式。進一步而言,《元文類》處理宋、金、元三代交接之際的階段時,其呈現之內容與脈絡,與其書名所指涉的“元”、“國朝”會產生一定的衝突。

總集呈現的詩文發展脈絡分成多重層次,包括編者選定的時代範圍、文體排列的順序,以及每一文體內的作品排序。關於第一重層次,如陳旅的序言,《文選》收錄“秦漢魏晉之文”,唐宋之文分別見於《唐文粹》、《宋文鑑》,而元代的篇章則見《元文類》。每部總集皆有“一代之文”,只要並列它們,便可考察出歷代文章發展的整體面貌;第二個層面則可追溯至蕭統的《文選序》。其文在談論“文”自創始及至當世的歷程中,先從“詩六義”中的“賦”入手,繼而述說詩歌從四言、五言到雜言的變化,再及至由詩歌衍生出來的頌、贊,最後從箴戒論銘到碑碣誌狀諸體,至成“衆制鋒起,源流間出”之勢。<sup>12</sup> 從《文選》以賦為首,祭文為末的文體排序可知,編者的確落實了蕭統所論述的發展脈絡。如是者,總集的編輯操作具備了論述文體發展的意義。後於《文選》的總集雖多限於繼承前人的文體排序方法,鮮有重大新見,但部分細節上還是有其細心之處。《元文類》仍以賦、騷為首,不錄詩人的“樂章”繼之,再進入“四言”、“五言古詩”的詩歌部分。這與《文選序》謂之“四言五言,區以別矣”一致,視先後出現的它們為較早的詩歌體式。<sup>13</sup> 有趣的是,即使同為“古詩”,惟“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兩類卻為“樂府歌行”分隔。此關涉理學一派的詩學觀。同樣崇尚

11 宋濂：《元史》，卷189，頁4328—4329。

12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

13 同上注。

朱學的金履祥(1232—1303)編纂詩歌總集《濂洛風雅》時,在“七言古風”的開首位置標上了“今體”,表示其與稍前的“樂府”、“五言古風”存有古今之別。<sup>14</sup>儘管蘇天爵對“五言古詩”和“樂府歌行”的次序異於金履祥的看法,但加以區別“七言古詩”和“五言古詩”的做法則有當世的理學觀點為據。至於以“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為詩歌部分的收結,則符合從古體發展至近體的詩歌體式演變情況。總之,就整體結構來看,蘇天爵對詩歌體裁的排列大致呈現發展的觀念。

至於第三重脈絡,即每一文體之內的作品排序,則關涉由諸詩人組成的線索。整體而言,除了只收錄了兩首虞集所作的“四言”一類之外,其他幾類詩歌都是按照詩人的生卒先後為排列方法。例如,身處金末元初的元好問正是其中四類的開端,而宋本(1281—1334)、范梈(1272—1330)和活躍於惠宗時期的劉汶(生卒年不詳)等年代近於蘇天爵的詩人則出現於各類的最後一席。固然,此種排序方式是最直接和便利的編輯方法,於古文獻中可謂常見;惟從效果觀之,它構成了依時序的詩人名單,意義等同以人為綱的詩歌史,不宜輕視。而在《元文類》的排序中,蘇天爵的安排亦非純粹出於隨機,諸如卷五“七言古詩”連續收錄劉因的《歸去來圖》,以及分別出自盧摯(1241—1315)和尚野(1244—1319)的《淵明歸來圖》,顯示同題創作之風;<sup>15</sup>在卷六“七言律詩”中,除了並列段克己(1196—1254)和段成己(1199—1279)兩兄弟之外,段克己的人選作品更是《和家弟誠之詩韻》,使二人扣連起來。由此推斷,蘇天爵在編選時有其考慮,置於同一類的詩人有串連起來的可能性。

當然,更重要的是,蘇天爵在組織這些線索時對當世詩人有所取捨。《元文類》的篇幅顯然不能全面涵蓋元代詩歌。於詩人和作品的角度來看,它都是一部取捨嚴苛的選集。陳旅指出,蘇天爵的編選原則如下:

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

14 金履祥輯:《濂洛風雅》(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卷4,頁253。

15 蘇天爵編:《元文類》,頁6—7。

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sup>16</sup>

所謂“繫於政治”、“輔翼史氏”即史學價值；“補於世教”和“足以範俗”是理學所強調的教化意義，源自儒家“詩教”觀。而“雅製”就是在詩教意義上延伸出來的藝術主張。蘇天爵的寄意橫跨了這三個範疇。然以上原則可寬可嚴，其實際操作上大概尚有其他未有言明的細節。陳漢文指出，《元文類》的選篇代表了蘇天爵理想中的大都文人群體，即一個以師友淵源連繫的人際網絡，故多番與他切磋虞集、馬祖常成為了總集中的代表人物。<sup>17</sup> 其先師劉因在總集中的詩歌數量亦是超群，計 53 首，反映出對蘇天爵對師友的傾重。另一方面，論者又表示，他忽略了大量活躍於其時，於詩歌史上亦是影響深遠的詩人，包括耶律楚材（1190—1244）、戴表元（1244—1310）、鄧牧（1246—1306）、方回（1227—1307）和劉將孫（1527—？）等。<sup>18</sup> 可見蘇天爵對詩人的選取相當主觀。《元文類》以《文選》為目標，二書體例亦是相似，則其效法的除了採集“國家文章”的行為外，還有《文選》一脈提出的總集原理和編選概念。

須要補充的是，過去部分總集的編選結果偏狹，乃源於編者材料不足，加上記憶力有限，以致著作的篇幅和內容不全。但這不可能是蘇天爵的處境。按文獻記載，蘇天爵重視並精於搜集史料，更建立滋溪書堂，藏書過萬卷。<sup>19</sup> 論者普遍相信，其著作之多，就是有賴這批豐厚的資料。<sup>20</sup> 是以他於材料方面理應運用自如。況且，陳旅的序亦強調《元文類》的成書是二十年來努力的成果，則表示蘇天爵在時間方面亦十分充裕，編選決定當經深思熟慮。其建構之線索值得小心探究。

藉“總集”概念的特點，編者從“文學場域”的角度出發，建構以詩人為線索

16 陳旅：《國朝文類序》，蘇天爵編：《元文類》，頁 5。

17 陳漢文：《蘇天爵的〈元文類〉與元代中後期的大都文壇》，頁 297。

18 金開誠、葛兆光：《古詩文要籍叙錄》（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198。案：書中指出王惲（1227—1304）的篇章同樣不獲收錄，但其實《元文類》卷 4 收錄了他的《義俠行》。

19 元人趙汭（1319—1369）於《書趙郡蘇公所藏經史遺事後》嘗謂蘇天爵“家藏書萬卷年，於遼、金逸事，宋代遺文，猶拳拳收購不倦”。詳見趙汭：《東山存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冊 1221，卷 5，頁 292。

20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859。

的詩歌史,因而與“國朝”此從屬“政治場域”的用語產生不協調的情況。對比唐宋兩代的過度,元代的情況無疑更複雜。早在入主中原以前,蒙古已於北方建立強大的帝國,其草原文化亦是源遠流長。至十三世紀初,蒙古積極南下,攻伐高麗等地。窩闊台(1186—1241)後來在公元1234年吞併金國。其子忽必烈(1215—1294)繼位後在中原一帶自立為帝,建立史稱之“大元帝國”,與其他蒙古領袖決裂之餘,繼續攻向南宋。最後,在1279年,陸秀夫(1236—1279)背著幼主投海而亡,南宋滅亡,元世祖終於結束北宋靖康之難以來,逾一百五十年的南北分裂局面,中原復歸統一。以上漫長而複雜的史事,對學術研究構成定義上的困難,特別是難以定斷起點位置。今人查洪德處理元代理學與文學的關係時表示,雖然一般傳統的學術思想史和詩文發展史都會把“元代”的開端定義為金亡時期,但線索實應該追溯到得成吉思汗(1162—1227)器重的耶律楚材。<sup>21</sup> 如前文言,文化是延續發展的,忽必列立國的政治事件不當與文化發展的線索混為一談。按照另一今人邱江寧整理,歷來定義“元代文學”之起點大致有五個:成吉思汗立國(正史《元史》的起點)、南宋滅國(漢族本位立場)、金代滅亡(常見於明清時的論述)、忽必烈稱帝,以及其於中統五年(1264)改國號為“大元”的一刻。<sup>22</sup> 事實上,現代論者往往據學科和題目需要選取有利的時間點,並無共識。不難想像,身為元代文臣的蘇天爵對“元代詩歌史”之起點的判斷將涉及政治立場、詩學觀念、身分認同、文化正統等來自不同場域與身分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問題落於詩歌史的討論時,文化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問題亦會變得更加複雜。蘇天爵以“國朝”篇章為編選對象,記錄“國家文章之盛”,期望使之“赫然休光耀於將來”,表現出對元代文化成就的自信之餘,亦積極建立“元文”的主體性,使之足以於《宋文鑑》之宋文、《唐文粹》之唐文鼎足而立,各自為一個時代的美好象徵。問題在於,所謂“元文”的本質究竟是甚麼?元代的統治階級是蒙古人,亦即中原的外來者,本來擁有自身的文化淵源,但同時,中原地區的文化發展亦是根深柢固,時常出現同化外來者的現象。而

21 查洪德:《理學背景下的元代文論與詩文》(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

22 邱江寧:《元代館閣文人活動繫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1。



觀乎元初，除了在位四年的元文宗外，元代統治者普遍冷待中原文藝，長期放任漢族臣民的言辭與文字。<sup>23</sup> 部分君主甚至有漢化的傾向，採取漢人舊有的官僚系統，亦起用漢儒為文臣，而文化政策的主導權亦因此落入中原一方。所謂“元詩”者本質上亦是漢文化的產物。就如《元文類》中雖有富珠哩朮（又名李朮魯朮，生卒年不詳）和圖克坦公履（又名徒單公履，生卒年不詳）等外族詩人，但其作品還是一直流行於中原的古體詩和近體詩。外來的文化衝擊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在入元以前，中原文化的正統問題早已經徘徊於金代和南宋之間，於入元之際亦未曾解決。分別來自兩方詩壇的成員繼續活動、創作，延續各自的源流，在元代仍舊保持著影響力，甚至直接影響元詩的發展。如此，所謂“元文”實包含宋、金、元三方的線索。

蘇天爵以“國朝”之名為自身時代的文化建立主體性，必會觸及“元文”或“元詩”概念中的混雜之處。尤其在開端部分，金代、南宋滅國未久，於中原的文化影響力仍然甚有流通，那麼“元詩”的界線該如何判斷？既然不可能直接割裂前代的存在，其又可以如安排，使“國朝”的主體性不受損害，達至編者期許的文化理想？總之，在場域的交錯與主體性的問題下，《元文類》可體現蘇天爵的取捨。

### 三、元好問的位置與詩學正統的傳承

觀乎《元文類》的選詩部分，從卷二的“四言詩”到卷七的“七言絕句”共有十個類別，而在其中七類當中，起首的詩作都是出自三位金代遺民的手筆，傾向頗為明顯。他們分別為元好問、楊奐（1186—1255）、張澄（？—1153），三人皆拒仕元。元好問的詩作數量雖只有8首，卻遍及四類，成為“五言古詩”、“樂府歌行”、“七言古詩”和“七言律詩”的開端。<sup>24</sup> 如此位置透露出蘇天爵對金詩

<sup>23</sup> 楊鐮：《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頁9—11。

<sup>24</sup> 除了以元好問之作為首的四個類別之外，其餘各類的情況如下：“四言詩”始於虞集，“雜言”始終劉因，“雜體”始終陳孚（1240—1303），“五言律詩”始於張澄，“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都始於楊奐。須要注明的是，“四言詩”其實只由兩首虞集之作構成，故不成脈絡；“雜體”只有兩首作品，分別屬於陳孚和袁裒（1260—1320），亦不太足以稱作“脈絡”。

的態度,建構出金元兩代詩學的勾連。

元好問生於太原(今山西省)的大族,少時從學於名儒郝天挺(1161—1217)。進京求仕期間,他憑詩藝獲得“元才子”之名,為朝廷大臣所注意。在蒙古南侵,金哀宗出逃時,他以七品之身留守國都,親歷國破家亡,其後一直以遺民身分活動——期間,他曾聯絡耶律楚材和忽必烈,並受禮遇,卻是旨在懇求元朝保存金代的人才,未有為自身求仕。他在餘生只是積極搜集金代史料,史稱:“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採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sup>25</sup>其成果主要見史著《金源君臣言行錄》和詩歌總集《中州集》,而後者是“以詩存史”的典範著作。

蘇天爵把元好問的作品選入總集,以之為四個類別的開端,固然是因為無從否認其對元代詩人的影響力。清人顧嗣立於《寒窗詩話》言:“元詩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遺山,而郝陵川、劉靜修之徒繼之,至中統、至元而大盛。”<sup>26</sup>其對元詩發展過程的梳理,大概與蘇天爵在總集中呈現的主張相近。《元文類》稍後的部分又收錄了王惲、魏初(1226—1286)和郝天挺(1247—1313)的作品。<sup>27</sup>他們都是從學於元好問的,而郝天挺更加為元好問的詩歌總集《唐詩鼓吹》作注,於詩學主張方面有直接連繫。問題就在於,就總集的名稱來看,蘇天爵何以認為元好問可以容於“國朝”的名目之下?面對這位橫跨兩代的詩人,現代論者的取態都是不定的。固然,不少學者沿用顧嗣立及其《元詩選》的立場。查洪德在追溯元詩起點時正是先引顧嗣立為據,再稱:“元好問應該說是元代詩人。”<sup>28</sup>惟從“應該說是”一語可知,此判斷存有爭議空間。其實亦有不少論者把元好問歸入金代的脈絡,使之割裂於元代的範圍。<sup>29</sup>現代學界尚且猶豫不

25 脱脱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26,頁2742。

26 顧嗣立:《寒窗詩話》,丁福保編:《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83。

27 案,金代和元代都有名叫“郝天挺”的名人。金代者,字晉卿,澤州陵川人,為元好問的老師,也是大儒郝經(1223—1275)的祖父;元代者,字繼先,蒙古木魯族人,為元好問的學生。

28 查洪德:《理學背景下的元代文論與詩文》,頁11。

29 例如,游國恩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介紹元好問的章節見於第五編《宋代文學》以下的第十章第二節,而其第六編則取名《元代文學》,顯然把元好問排除在外。詳見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中國文學史》(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1986年),冊3,頁159—163。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的《元明詩概說》中,第一章《十三(轉下頁)》

定，蘇天爵既為元臣，又要考慮到元代文化的主體性問題，處境則更加特殊，不可能掉以輕心。尤其於他而言，元好問是時代相距不遠的近人，其人際網絡、活動痕跡以至詩學影響仍然是切身可感的。<sup>30</sup>

考乎文獻，元好問對“金人”身分甚有堅持。他拒絕出仕之後，把餘生的精力花在整存金史的工作上，表現出異常的熱情。《金史》如此記述其志行：

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sup>31</sup>

為了流傳“一代之跡”於後世，其細緻無遺的記錄達到“百餘萬言”的篇幅，證明一切絕非空言。《金史》於上述引文之外又有記載，稱他為一睹失佚的《金寶錄》，竟不顧身段，打算巴結居於天順的張萬戶，卻為友人阻止，只好失望而回。其熱情之誇張顯然易見。而在詩歌史的層面，《中州集》的編纂同樣表現出對金代文化的不忍。其《中州鼓吹翰苑英華序》云：

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滯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為事。馮、劉之言日往來於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多為苦心

（接上頁）世紀前半：金之亡國與抗議詩》的第二節和第三節介紹元好問及其《中州集》，第四節談的更是時代早於他的耶律楚材，而第二章則是《十三世紀後半：南宋亡國與抗議詩》，至第三章方為《元詩的成熟》，可見吉川幸次郎也是偏向把元好問納入金代。詳見氏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21—129。至於其他現代學者的專書，亦有許多類似的例子，如徐子方的《元代文人心態史》不以元好問為討論對象，只略略在談郝經時提及他的存在，以作對照。見氏著：《元代文人心態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36。文師華的《金元詩學理論研究》又把元好問的詩論放在上編《金代詩學理論》，而不納入以《元代前學詩學》一節開展話題的《元代詩學理論》。見氏著：《金元詩學理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43—72。類似例子繁多，難以一一窮盡，在此僅作舉隅。

<sup>30</sup> 值得補充的是，如把《元文類》中的其他文體都納入考察範圍，便會發在於記、序、書、題跋、雜著、墓誌、神道碑七類中，元好問的作品都是居於開首。可見蘇天爵對元好問之地位的判斷，並不限於詩學範圍之內，而是置之於更廣泛的文章與文化層面。

<sup>31</sup> 脫脫等：《金史》，卷126，頁2742。

之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爲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遊諸人之詩，隨即錄之。<sup>32</sup>

此書成於蒙古勢如破竹，金國已告傾覆時，戰情之急轉變爲亡國之恨。他無力重振金國，唯一可做的是保存百餘年來的金國詩人與其作品，使之免於“湮滅而無聞”的不幸。而詩歌的文字和情感，亦是他自身與歷輩詩壇中人的記憶，故這種保存工作在國破家亡的離散(diaspora)場景中，亦成了自我救贖、對抗殘酷現實的表現。根據英國學者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的歸納，“重現舊物”正是其中一種非暴力，以文化爲手段的社會抗爭行爲。<sup>33</sup> 可知就自我身分認同而言，元好問清晰地以“金人”自居，在入元以後仍努力不懈地對故國展現忠義與歸屬感。

有趣的是，元好問對自身身分的定義，實得元室認可。就如剛才的引文所示，元好問的事蹟見元人脫脫(又名托克托，1314—1355)主編的《金史·文藝傳》。就元好問晚年的立場，書中明言：“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sup>34</sup> 文中的“國”無疑指稱“金源氏”之國，即元好問的晚年是緊扣金代的。《金史》乃元室爲前朝編修的國史，論述每代表朝廷的立場，具政治權威地位。況且，蘇天爵早年在翰林國史院供職，參與過《宋史》、《金史》、《遼史》三部史書的修撰工作。<sup>35</sup> 他大概知悉元好問獲錄入《金史》範圍之事，以及國史對其身分定位的立場。換言之，他在編選《元文類》時選擇以元好問之作爲重要的起始點，其考慮並無完全跟從官方史學所言。進言之，在“文學場域”的語境中，“國朝”之意與其於“政治場域”的指向

<sup>32</sup> 元好問：《中州鼓吹翰苑英華序》，張靜校注：《中州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1。

<sup>33</sup> Stuart Hall,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Raphael Samuel, eds.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Kegan-Routledge, 1981, pp.235.

<sup>34</sup> 脫脫等：《金史》，卷126，頁2742。

<sup>35</sup> 根據《元史》記載，蘇天爵於“泰定元年（1324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宋濂：《元史》，卷183，頁4224。

產生了差別。

至於差別的原由，則與詩學傳承的正統問題有關。詩歌與詩學不是元代獨有的產物，《元文類》不能迴避元詩如何繼承前人的問題。而在處理這問題時，蘇天爵亦打算以自己的身分爭取話語權。意即他運用了“國朝”的名目和編者的權力，建構出權威論述，描述出元代文化的“正確”發展模式，從而顯示其正當性與優良之處。據今人陳高華、孟繁清的說法，蘇天爵對元朝的統治有著“極端忠誠”，相信元朝是“正統”所在，即取代金、宋二朝而統一全國，具天命所歸一般的合理性。<sup>36</sup> 這種對“正統”的認同與崇拜，亦見他對詩文發展之傳承的觀察。其於《書吳子高詩稿後》一文謂：“我國家平定中國，士踵金、宋餘習，文辭率羈豪衰茶。”<sup>37</sup> 金、宋在元代平定中原後已成過去，但士人的文辭卻繼承了兩代“餘習”。亡國之地的“餘習”不具繼續發展的可能性，其意義在於交到新生的元代手中，好讓後來者孕育自身文化。蘇天爵正是以這種態度接受在前代與元代之間徘徊的人物，並在每類詩歌體裁中，把這批為數不多的作品放於較前位置。如是者，《元文類》以“元文”的主體性為前提，把宋、金兩代之作視作“餘習”，展現出元代文化作為正統的地位。

當然，在“餘習”的概念裏，金、宋兩代的地位並不平等。這涉及到前代正統之形態的問題。蘇天爵本已關心此事，嘗與謝端（1279—1340）撰文梳理，史稱他們“辨金、宋正統甚悉，世多傳之”。<sup>38</sup> 從“世多傳之”一語，知道這討論非一時興之所致，而是有意建構公論。根據趙汭所撰《書蘇參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後》，虞集甚至如此稱讚他的說法：“若夫世之不齊，異論蠡起，自非高見遠識公萬世以為心者，安能明決如是乎？”<sup>39</sup> 在《元文類》，從前文可知，蘇天爵重視元好問的地位，而各類詩歌中，位處首位的皆非故宋詩人。他對金代的偏好相當顯著。就如剛才引述之《書吳子高詩稿後》中，他強調士所踵者乃“金、宋餘習”，先“金”後“宋”，正是含價值判斷的表達方式。除了陳旅之外，王理（生卒

<sup>36</sup> 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8—9。

<sup>37</sup> 同上注，頁495。

<sup>38</sup> 宋濂：《元史》，卷182，頁4207。

<sup>39</sup> 趙汭：《東山存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21，卷5，頁294。

年不詳)也有《國朝文類序》,言此書“大凡國朝文類,合金人、江左以攷國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觀其成,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sup>40</sup> 其以“江左”爲稱呼,不用“宋”之名號,更有意表明元代以前的正統在北方的金代,而不在南方的趙宋。蘇天爵的文章亦不時以“遷國江左”之類的說法描述南宋政權。<sup>41</sup> 其不如南宋文人般謂之“南渡”者,強調了金代對北宋的攻滅。

其時,在金代一方而言,靖康之難後,趙宋已經覆滅,中原文化的正統已經轉移到他們身上,而南渡於江左的趙宋不再具有崇高地位,只是苟延殘喘的餘孽。金人因而樂於學習北宋時期的文風,特別是蘇軾(1037—1101)的風格,同時又對南宋的詩文擺出敵對和輕視的姿態。例如,王若虛(1174—1243)談及大盛於南宋的江西詩派時,就說:“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當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sup>42</sup> 先指責開江西之風的黃庭堅(1045—1105),又恥笑奉之爲宗師的南宋後輩。在他看來,黃庭堅的作詩法度實爲剽竊之流,不足以成“衣鉢相傳”的詩學。元好問在《自題中州集後五首》的首兩作中,甚至對南宋詩風擺出自負一面。其詩如下:

鄴下曹劉氣盡豪,江東諸謝韻尤高。

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其一)

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

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其二)<sup>43</sup>

他在《其一》以曹魏的鄴下詩人和南朝的江東詩人爲喻,形容當時南北詩風對峙的情況。他還認爲,雙方以“詩品華實”較勁的話,南方“吳儂”將不能贏得優

40 王理:《國朝文類序》,蘇天爵編:《元類文》,頁1。

41 例如,《題諸公贈范偉可訪尋祖墓詩後》謂:“及遷國江左,南北隔絕。”見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卷28,頁471;《書袁德平文稿後》則記:“及遷國江左,一時大儒各以其學興起於世。”同上注,頁472。另外,《題泉州士子贈崔宗禮詩後》亦說:“宋氏徙江左,龜山楊先生載道而南。”同上注,卷30,頁510—511。

42 王若虛:《滹南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3,頁523。

43 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331。

勝的錦袍，即勝利者是金人。《其二》更是自視甚高地與南宋的江西詩風徹底切割。如詩題示，此詩扣連盡收金代詩歌的《中州集》就。在這語境下，他以一代文化之繼承人身分代表“北人”發言，自命為正統詩學的精英。而蘇天爵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北方人，其師安熙、先師劉因俱為代表北方學術的大儒，所以他長期受到金國所在的北方文化薰陶，難免對此產生深厚的認同感。在兩代“餘習”當中，《元文類》大幅傾重金代詩人的地位，甚至暗示金代為過去之正統，實為無可厚非之事。

關於元好問的詩作在《元文類》中的情況，尚有一點值得關注，就是書中作品如何建構詩人形象。雖然蘇天爵認同元好問在元詩的起始位置，卻不代表會傳頌其遺民身分。而總集的編選手法，正好會透過篩選詩作，調整詩人的形象。尤其在這部總集中，元好問之作僅 8 首，不足以代表其一生經歷與情感起伏。<sup>44</sup> 不難發現，《元文類》所選大多不涉具體寫作背景。以“樂府歌行”為例，《湘夫人詠》藉《楚辭·九歌》的意境加以發揮，想像古人的神話傳說，大致不干時事；《塞上曲》和《征人怨》抒發征人在外不得回，只能苦思故鄉、故人之悲，著重抒寫寂寞的情感，未有言明出征原由；《西樓曲》較明確地指向戰亂，寫女子得悉情郎命喪戰火中而深感悲痛，但內容始終沒指向具體的人事，以致後人無從知其本事。至於《梁園春》是寫都城美景的詩歌，而《元文類》在詩後錄入元好問留下的自注，以解釋“宮鶯催賞玉谿花”和“誰憐麗澤門邊柳”兩句：“龍德宮有玉谿館。麗澤，燕都西門名。”<sup>45</sup> 燕都即為金代的首都，元好問的詩歌對金國的具體記憶由此連繫起來。當然，據今人考證，此詩作於元好問初出茅廬，尚未南渡的時期，而不是亡國以後，亦與他的遺民身分關係不大。<sup>46</sup>

至於出現於其他三類的作品，則相對深入元好問的生平和情感。例如是“七言律詩”中的《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此詩大概寫在元太宗七年（1235）

44 據今人統計，元好問的詩歌現存近一千四百首。見狄寶心：《前言》，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頁 6。

45 蘇天爵：《元文類》，卷 4，頁 2。

46 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頁 13—15。案：元好問的詩歌中，《梁園春》為五首組成的組詩，《元文類》所錄實為《其五》而已。

乙未,是金代亡後,他被迫遷居冠氏期間,與朋友在杏園燕集中的唱和之作。<sup>47</sup>此詩主要按照杏園唱和的主題,描寫杏花的淒美,又藉由“無那”、“殘陽”和“漢苑招魂”諸語表達淡淡的哀愁。<sup>48</sup>哀愁只源於眼前景像的渲染,還是與時局背景有關?詩中沒明確的提示,不宜過份肯定,但“杏花”這一題材是值得注意的。元好問好寫杏花,現存的相關作品不下數十。吉川幸次郎指出,於荒涼的北方,春時開放的杏花最爲艷麗,而元好問的書寫下,杏花從未開到開放,以至落下的生命階段往往寄託了自身正在抑壓的亡國之痛。<sup>49</sup>至於另外兩首,則有指向具體。《箕山》詩云:

幽林轉陰崖,鳥道人跡絕。許君棲隱地,唯有太古雪。  
人間黃屋貴,物外祇自潔。尚厭一瓢喧,重負寧所屑,  
降衷均義稟,汨利忘智決。得隴又望蜀,有齊安用薛?  
干戈幾蠻觸,宇宙日流血。魯連蹈東海,夷齊采薇蕨。  
至今陽城山,衡華兩丘垤。古人不可作,百念肝肺熱。  
浩歌北風前,悠悠送孤月。<sup>50</sup>

箕山相傳是上古隱士許由(生卒年不詳)的隱居地,元好問以此入詩,歌頌許由淡泊世利,超然物外的同時,亦循“得隴又望蜀”四句的多個典故,慨嘆俗世蠻人對世利貪得無厭,致使爭戰不斷,血流成河。如今許由已是遙不可及,今人在以“北風”爲喻的蒙古軍馬前,是否逃不出蠻人的爭戰?他由此帶出金人對局勢的不安。基於類別排序,這首“五言古詩”是元好問諸作中,最先出現於《元文類》的作品,而巧合之處是,這首詩也是元好問早年成名的契機。據《金史》記載,從郝天挺處學成以後,他便“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台》等詩。禮

47 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頁715。

48 蘇天爵:《元文類》,卷6,頁9。

49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47—48。

50 蘇天爵:《元文類》,卷3,頁1。



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sup>51</sup> 此爲他晉身金代大家的代表作之一。《元文類》選錄此詩，除了具體反映出元好問的詩歌風格外，也記錄了他在詩歌史的成就與地位。這對理解元好問的詩人形象甚有幫助。至於最後一首入選的，就是《鄧州城樓》，詩云：

鄧州城下湍水流，鄧州城隅多古丘。  
隆中布衣不復見，浮雲西北空悠悠。  
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叫月蒼煙愁。  
自古江山感游子，今人誰解賦登樓？<sup>52</sup>

論者多言此詩寫於哀宗正大七年（1230）庚寅，其時元好問在鄧州（今河南省鄧州市）協助守將移剌瑗（生卒年不詳）。<sup>53</sup> 詩中慨嘆金國缺乏諸葛亮（181—234）般的人才，不可能靠“隆中布衣”之力抵抗外敵，並擔心作爲“西北浮雲”的蒙古鐵騎將撼動山河國土。對比剛才提及之作，此詩最直接指向蒙古南侵，但從內容可見，其抒發的主要是憂國愁思，對外敵的激昂或仇恨反而不多著墨。換言之，蘇天爵編選的詩歌中，除了《鄧州城樓》外，其實沒具體觸及金代國變，其餘作品或如《箕山》和《梁園春》般隱晦指向金國時代的記憶，或如《西樓曲》等在沒有具體指涉下空談戰亂的慘況，甚或如《湘夫人詠》等樂府般，與現實情勢不見關係，連具體寫作背景亦難以考證。元好問曾與元代敵對，還有不肯仕元的立場，幾乎不被提及。其遺民身分在總集中幾乎消失，淪爲純粹展示詩藝的前輩詩人。

#### 四、《元文類》中的前朝記憶與遺民情感

透過元好問的情況，大概可知蘇天爵在編選過程中如何接受這些來自前

<sup>51</sup> 脱脱等：《金史》，卷126，頁2741。

<sup>52</sup> 蘇天爵：《元文類》，卷5，頁1。

<sup>53</sup> 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頁532。

朝,並對初期的元詩產生影響的詩人。當然,在元詩的發展過程中,來自前朝的影響絕不可能限於元好問一人,而這批詩人當中,亦非全都抱著支持元室的立場。他們可能以“遺民”身分自居的同時,筆下的作品亦難免表現出涉及前朝的記憶與情感。這終究是早期元代詩壇中的一個面相。即使蘇天爵有著避重就輕的準備,但在書寫元詩發展過程時,為免過度扭曲真實的情況,總可能遇上難以徹底迴避的場合。就種種比元好問更複雜的情況,《元文類》的處理手法值得再加探究。

從詩人名單來看,《元文類》樂於選取在戰時或戰後投降,加入新朝仕宦行列的詩人,例如早年仕金的楊果(1195—1269)、曾仕宋的程鉅夫(1249—1318)、背叛了越南陳朝的陳益稷(1254—1329)等。像劉祁(1203—1259)和楊奐(1186—1255)般,入元初期抗拒新朝,後來才參加科舉,進而出仕者,亦當計入其中。<sup>54</sup> 原來從屬於不同政權的投降者,呈現出天下歸順於元朝的盛勢,於政治層面確立元室的正當性。而在詩歌史方面,這亦塑造出集前代之大成的發展模式,是為強盛的表現。當然,數最具代表性的降元詩人,則莫過於趙孟頫(1254—1322)。他是宋代宗室的一份子,後經程鉅夫招攬而出仕,最終成為成就卓著的館閣文人。在《元文類》的選詩中,趙孟頫的詩作共 42 首,數量於眾詩人中排行第二,僅次於劉因一人。蘇天爵對他的重視顯然易見。究其原因,一方面與他的詩學地位和成就有關,正如《元史》形容他的“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表現非凡;<sup>55</sup> 另一方面,則與其於蒙元朝堂上的特殊意義有關。《元史》花上不少篇幅記其與忽必烈的對答,內容每每關於宋代的政治人事,而趙孟頫總是謹慎並消極地回應。<sup>56</sup> 這種近乎試探的行為源於趙孟頫

54 劉祁,字京叔,金國滅亡後一度“北還鄉里,躬耕自給”,期間撰寫講述金代歷史的《歸潛志》。及至公元 1238 年,他參加“戊戌選試”,並成功出仕。詳見王惲:《渾源劉氏世德碑》,《秋澗先生大全文集》(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 年),卷 58,頁 585。楊奐,字煥然,金國滅亡後決定北渡,其時“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聚而讀之”,遂展開了隱居講學的生活。他後來也參加“戊戌選試”,“兩中賦論第一”,成功出仕。見宋濂:《元史》,卷 153,頁 3621。

55 宋濂:《元史》,卷 172,頁 4022—4023。

56 在《元史》,忽必烈兩次向趙孟頫詢問宋事。第一次問葉李(1242—1292)、留夢炎(1219—1295)的風評,趙孟頫表示二人皆好,忽必烈卻斥留夢炎依附奸臣,建議趙孟頫“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趙孟頫遂賦詩云“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轉下頁)

的血脈。對於元朝來說，這位忠心侍奉君王，並從君王身上獲得認同與成就的前朝宗室，象徵了元朝徹底征服前代，以及文化層面上的凌駕，進而加強元代詩文的正統性與優越感。

不過，即使是降元者的詩歌，偶爾亦有提及前朝記憶的內容。就以楊奐為例，如剛才提及，在參加元朝的選試前，他確實一度以“遺民”身分在野過活。從敵軍犯境到家國破亡的經驗，終究是人生中的重大衝擊，尚未知曉前路的他難免就此賦詩抒情。《元文類》在“五言絕句”一類中，就收錄了其組詩《錄汴梁宮人語》。單從詩題來看，已是開宗明義地指向金國宮廷的人事與記憶。此組詩由 19 首作品組成，透過代入宮人視角，並模擬其聲音，書寫她們在宮中生活期間的所思所感，如長居深宮的寂寞、每年元宵夜時的羞怯，以及執行宮廷禮儀的情況。這些內容與金國的興亡沒重大關連，即使抽去時空背景，亦可視作一般書寫宮廷女性的詩歌。但在最後六首，楊奐筆鋒一轉。其詩如下：

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事有心情。（其十四）  
 爲道圍城久，粧奩鬪犒軍。入春渾斷絕，飢苦不堪聞。（其十五）  
 監國推梁邸，初頭靜不知。但疑牆外笑，人有看宮時。（其十六）  
 別殿弓刀響，倉黃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強添粧。（其十七）  
 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針線，記得在窻間。（其十八）  
 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爲生。（其十九）<sup>57</sup>

元人陶宗儀（1329—1410）形容此詩“雖一時之所寄興，亦不無傷感之意”。<sup>58</sup>其所稱之“傷感之意”大概就是由這部分流露出來。《其十四》以“二后睢陽去”帶出離散的情境，接以“潛身泣到明”一句明言悲痛之情。即使此處未有明言所爲何事，但及至《其十五》即道出“圍城”之事，直接指向當日哀宗出逃後，汴

（接上頁）忠直報皇元”；第二次則請趙孟頫以趙宋宗室身分介紹宋太祖“行事”，趙孟頫“謝不知”，遂被忽必烈取笑。同上注，頁 4020—4021。

57 蘇天爵：《元文類》，卷 8，頁 2—3。

58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 18，頁 222。

京遭蒙軍包圍的絕境。詩中的主人公只有女子所用的“粧奩”，於軍隊男丁而言毫無用處，惟有强行忍受“入春”以來的“飢苦”。而《其十八》藉“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一句，道出亂局當中，人人隨時遇上生離死別之事，一切盡是不能掌握，只有悽愴與驚惶。他直接寫出了金代國難的記憶。及至《其十九》，詩中只寫“北去遷沙漠”的羈旅之苦，但考慮到此為組詩的收結，便可知“不如當日死”的“當日”概為金國為戰火所滅時。回顧《元文類》的編選原則，蘇天爵強調“世教”與“雅製”外，還有“輔翼史氏”的目標。此詩反映出金人面對國變的感受和見聞，無疑具補充有關歷史場面的效果。蘇天爵選錄此詩，實不足為奇。有趣的是，在這些國難記憶中，蒙古大軍作為攻伐金國的敵人，近乎不存在於文本中。楊奐的書寫反而集中於金國的內亂，如《其十六》開首一句即謂“監國推梁邸，倉黃接鄭王”。此處指向金哀宗出逃後，汴京守將崔立（？—1223）的政變。《金史·哀宗本紀》曰：

戊辰，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舉兵為亂，殺參知政事完顏奴申、樞密副使完顏斜撚阿不，勒兵入見太后，傳令召衛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即自為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尋自稱左丞相、都元帥、尚書令、鄭王。<sup>59</sup>

句中的“監國”和“鄭王”直接指稱其時的叛亂份子，毫無隱諱，可知此詩記錄了金國內亂時的狀況。由於組詩採取了宮人的角度，所以對比遠在城外的敵軍，其內容更易觸及臣子造反之事，並塑造出內憂之兇險甚於外患的感覺。同樣入選《元文類》的劉祁在尚未仕元時著有記載金代野史的《歸潛志》。按論者歸納，此書強調金代後期的政治腐敗與不事民生之事，亦指斥金代君臣在蒙古大軍面前胸無遠略，苟且偷安。<sup>60</sup> 楊奐在此的態度相信亦是如此，即對比蒙軍，他們更傾向認為金代衰亡其實源於自身的崩潰。是以這些回憶前朝的詩文並無損元代統治的正當性，蘇天爵的編選更有助還原歷史的面貌，達至“補史”的

59 脱脱等：《金史》，卷18，頁396。

60 宋德金：《劉祁與〈歸潛志〉》，《史學月刊》1982年第3期，頁25。

目的。

關於前朝的重要歷史記憶，還有徐世隆（1206—1285）的《挽文丞相》。徐世隆於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進士及第，出仕初期入嚴實（1182—1240）幕府，後來官至吏部尚書。<sup>61</sup> 蘇天爵所選詩歌中，徐世隆之作唯有此首。詩云：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  
義似漢皇封齒日，忠於蜀將斫頭時。  
乾坤日月華夷見，海嶺風霜草木知。  
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sup>62</sup>

在南宋末期，文天祥（1236—1283）嘗以丞相身分凝聚臣民的力量，是抗元勢力的中心人物。其於崖山一役慘敗，及後被蒙古人所禽，長期囚於大都，最後慷慨就義——種種事蹟在當世廣泛流傳，使之從在生到死後都如同英雄一般為人歌頌，在宋遺民圈子中更是具有重大意義的象徵符號。不過，徐世隆從前是金人，所以對文天祥的情感不如宋人般激昂。在此詩中，他指出文天祥不該殺，因為這樣有助成全“君義臣忠”的道德價值，是為互惠互利，所以他其實是就元室的利益發言。較敏感的只有頸聯“華夷”一語，畢竟容易牽連元室的外族身分，在此或可理解其所稱為，殺與不殺是道德與野蠻的分別，並不是指向種族之事。此詩實寫於元室囚禁文天祥，猶豫如何處理之時，陶宗儀讚揚它有“善風刺”之價值。<sup>63</sup> 就如尾聯謂“只恐史官編不盡”，此詩無疑甚具史料價值，有補於史官之未書的貢獻，符合蘇天爵的編選原則。而對比宋遺民，以徐世隆的角度觸及文天祥之事，亦是明智之舉。事實上，這奮力抗元的人物未有成為元室治下的禁忌。除了徐世隆外，虞集也有同題之作：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

<sup>61</sup> 宋濂等：《元史》，卷 160，頁 3768—3770。

<sup>62</sup> 蘇天爵：《元文類》，卷 6，頁 11—12。

<sup>63</sup>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 4，頁 52。

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移。  
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  
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灑淚時。<sup>64</sup>

虞集雖爲南方人，祖先嘗爲南宋丞相，但他成長於元代，對南宋並無歸屬感。其立場是徹底站在元室一方，所以詩中採取歷史雄傑的角度看待文天祥，以爲南宋已是“落暉”，無力抵抗蒙古的“北風吹”，而文天祥的角色就如同張良（前262—前186）和諸葛亮般，雖有過人才華，亦是無力挽回大勢。詩中並無國仇家恨，“灑淚”只出於對古人的感慨，背後充滿歷史的距離感。加拿大學者珍妮弗·傑（Jennifer W. Jay）發現，在元代，宋末抗元義士的事蹟往往抽離了現實的政治語境，餘下不限於特定時空的道德教化意義，特別是儒家的忠義，因而可以爲任何背景的人所用，包括元室。<sup>65</sup> 從徐世隆之作的入選可見，這種現象似乎早已見於《元文類》中，即蘇天爵在不刺激抗元情感的前提下，以恰當的角度切入有關文天祥的歷史記憶。

當然，降臣的視角不能取代真正的遺民詩作。事實上，金末、宋末以至入元以後的時期，遺民的詩學活動一直保持活躍，作品數量可觀。以宋遺民爲例，趙景良（生卒年不詳）的《忠義集》收錄了宋末以來的遺民詩作，內容充滿激昂的抗元情緒；又例如吳渭等人主編的《月泉吟社詩》源自至元二十三年（1286）時的徵詩活動成果，表現出宋遺民拒仕蒙元的意志之餘，亦把宋人的詩學與氣節加以延續。當然，這些並存於元代詩壇中的面相，都不可能在以元室爲本的《元文類》裏得到充分的反映。蘇天爵對編選結果的操控顯然嚴謹。觀乎《元文類》收錄的詩人，金代或宋代遺民數量不多，其入選作品亦不是全都有關“遺民”的身分與立場。例如，杜瑛（1204—1273）的《留春曲》惋惜春天離去，無從挽留，繼而聯想到自己的年華亦如時節般流逝，如今已是滿頭銀絲。這是典型

64 虞集：《挽文山丞相》，王頌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冊上，頁162。

65 Jennifer W. Jay, *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ty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Washington: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1, pp.257.

的文人傷春之作，由來已久，與杜瑛由金入元後隱居不仕的立場無關。不過，在“七言古詩”，同為杜瑛手筆的《吊故宮》明顯表現出對金代的追憶，詩云：

月上觚稜椒壁濕，飢烏啄碎琅玕石。  
劫灰飛盡海揚塵，廢殿荒臺土花碧。  
洛陽書生汴梁客，一夜春風頭欲白。  
尊中賴有酒如泉，醉倚寒窗破愁寂。<sup>66</sup>

詩中頸聯明言“汴梁”此一地理概念，對金國的指向十分明顯。其首聯先著眼於牆壁與碎石，營造荒廢肅殺的氛圍，再於頷聯描寫出金代故宮破落的情況。“劫灰飛盡”一語說明了宮殿以至王朝的傾覆是一場慘痛的劫難，帶出了改朝易代之際的連天戰火有多可怕。由此即可知，尾聯所謂“愁寂”就是出於遺民身分的情感。杜瑛還有一首入選“七言律詩”的《秋思》。詩中以遊子角度出發，寫出秋意當中的古城情調，尾聯又謂：“千古繁華俱一夢，空餘草木戰風聲。”<sup>67</sup>這似乎亦是對已逝時代的懷念與憂傷。而除了金遺民之外，宋遺民亦有相似之作。《元文類》的“七言絕句”有梁棟（1242—1305）的《杭州聞角》，其詩如下：

聽徹哀吟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  
誰知盡是中原恨，吹到江南第一州。<sup>68</sup>

梁棟於宋度宗咸淳年間進士及第，曾出任小官，宋亡後先後居於杭州、建康，並醉心於茅山道術。詩中記述他在杭州偶然聽到如同哀吟的角聲，勾起了悠悠仇思。詩中雖然沒有點出換代或戰亂之事，但想到杭州曾是南宋首都臨安，加上就“中原恨”由北面“吹到江南第一州”的描述，亦可視為對蒙古南下侵占趙

<sup>66</sup> 蘇天爵：《元文類》，卷5，頁1。

<sup>67</sup> 同上注，卷6，頁10。

<sup>68</sup> 同上注，卷8，頁7。

宋的暗示。當然,這是相當隱晦的寫法。

上述二詩雖有哀思,但內容不算激烈。相較之下,楊弘道(1189—1271?)的《空村謠》於畫面的描述和表達的情感兩方面顯然更見激烈。此詩見“樂府歌行”一類,內容如下:

淒風羊角轉,曠野埃塵腥。膏血夜爲火,望際光青荧。頽垣府積灰,破屋仰見星。蓬蒿塞前路,瓦礫堆中庭。殺勦餘稚老,疲羸行欲傾。居空村問欲,何以供朝昏?氣息僅相屬,致詞難遽言。往時百餘家,今日數人存。傾筐長鑣隨日出,樹木有皮草有根。舂磨沃饑火,水土仍君恩。但恨誅求盡地底,官吏有時還到門。<sup>69</sup>

楊弘道早年爲金官,國變前夕爲避禍亂,遷居南方,改爲仕宋。及至宋亡,他又返回北方故鄉,其後多次移居。王惲的《儒士楊弘道賜號事狀》頌其晚年“窮居守道,垂老丘園,誠天民之先覺,清時之隱逸也”。<sup>70</sup> 雖然輾轉南北的經歷致使其身分認同變得複雜,但從此詩所書可知,國變時期的戰亂記憶確實觸動了他的心靈。詩中開首即寫出一個血流成河的廢墟。詩題所謂“空村”,就是形容該地少壯的人丁幾乎盡遭殺害,僅餘老弱幼兒等“數人存”,實在慘不忍睹。此處未有說明這麼無情的敵人就是蒙元,但只要置入有關時空背景來看,即會容易地聯想蒙古南侵的指向。有趣之處在於,詩中最後提出,在絕境中,朝廷官吏竟然還會登門苛索。如是者,筆鋒一轉,詩歌的矛頭由戰亂之殘酷,突然轉移至對腐敗朝政的控訴。即使楊弘道未如前文的降元者般,試圖隱去蒙古鐵騎的暴行,但結論似乎還是指出金室實非無辜可憐。本來,痛罵敵方和歌頌抗爭者往往是遺民詩作的常見表現,但《元文類》所選的多集中於個人對前朝的懷念和感慨,甚或是反思不足,明顯迴避了蒙軍的侵略者形象。

在數量有限的遺民詩作當中,劉辰翁(1232—1297)和林景熙(1242—1310)的入選最引人注目。因爲二人都是曾經採取激烈行動的抗元分子,與一

69 蘇天爵:《元文類》,卷4,頁3。

70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87,頁837。



般徒作懷念的遺民性質有別。劉辰翁，字會孟，早年在朝廷的史館和太學任官，宋末曾經在江西加入文天祥的勤王團隊，與蒙古人周旋。宋亡後，他拒絕出仕，自此隱居。曾身居前線者，自然會有慷慨激昂之作，但蘇天爵選的是其隱居時所作的《春晴》。其詩云：

江柳長天草色齊，新晴何物不芳菲。  
無因化作千蝴蝶，西蜀東吳款款歸。（其一）  
新燕池塘綠雨肥，初晴未暖日光微。  
角巾猶帶花梢濕，纔倚闌干見絮飛。（其二）<sup>71</sup>

整體而言，它們都是傷春之作，藉由春日晴時的種種景物，抒發出淡淡的哀怨。其題材、情調與前文提到的《留春曲》，以及見於“五言律詩”，出自金遺民張澄（字仲經，生卒年不詳）的《春思》都是相似的。今人方勇指出，在宋末元初的時代，春恨上升為所有遺民詩家、詞人的共同話語，無論是初春、仲春抑或暮春，都往往與哀痛欲絕的亡國傷悲扣連在一起，交織成通於整個遺民群體的失落心態。<sup>72</sup> 於是，劉辰翁在《元文類》中並不是抗元義士，而是承受失敗，黯自失落的遺民而已。

至於林景熙，則是長期活躍宋遺民圈子的領袖人物，尤以搶救宋帝遺骸一事聞名於世。至元十五年（1278），效力蒙元的西域僧人楊璉真伽（生卒年不詳）率眾盜掘以宋徽宗為首的多座帝陵，搶去陪葬財寶之餘，更把帝后遺骨移至“杭之故宮”，再築一座浮屠於其上，以“鎮南”為名行厭勝術，後來又把宋理宗的顱骨為飲器，加以玩弄。<sup>73</sup> 面對這般挑釁，按元人章祖程（生卒年不詳）所記，林景熙決定聯合一眾同道“相率為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回諸帝遺骸，又用魚網從湖中打撈出理宗的顱骨，並秘密安葬於越山。<sup>74</sup> 事後，眾人士氣高

71 蘇天爵編：《元文類》，卷8，頁7。

72 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41—143。

73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285，頁7315。

74 章祖程：《夢中作序》，林景熙著，章祖程注，陳增傑補注：《林景熙集補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3，頁317。

昂,於是立下盟約,結為汐社,也就是越中地區的首個宋人遺民詩社,名聲震於一時。<sup>75</sup> 方勇形容,林景熙與其他遺民連續不斷地活動,致使他的精神個性和詩風都得到強化,可見其身分並非一般隱居自傷的遺民可比。<sup>76</sup> 在《元文類》中,林景熙的詩作共兩首。第一首是屬“五言古詩”的《南山有高樹》,詩曰:

南山有高樹,寒鳥夜繞之。驚秋啼眇眇,風撓無寧枝。  
託身未得所,振羽將逝茲。高飛犯霜露,低飛觸茅茨。  
乾坤豈不容,顧影空自疑。徘徊向殘月,欲隨已復支。<sup>77</sup>

詩中藉由寒鳥在高飛與低飛之間的抉擇,認為就算落得顧影自疑的慘況,亦要振作起來,飛向殘月所在的高處,而不是為求託身而留於地上。雖然詩中沒有具體言明所稱為何事,但論者一般相信這詩與他的其他詩作共同指向仕元與否的人生選擇。尤其在林景熙的傳世詩作中,這是最早的一首,更具有開宗名義的意味。<sup>78</sup> 這見出其人格與志向。另一首入選的是屬“七言律詩”的《聞家大參南歸》,詩云:

濱死孤臣雪滿顛,冰瓊齧盡偶生全。  
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  
清唳秋荒遼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鵑。  
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sup>79</sup>

首聯所謂“孤臣”自然指向自己的宋臣身分,而其尾聯直接用上源自《詩經》的“黍離”意象,詩意中的亡國悲痛表露無遺。不過,觀乎全詩的內容,似乎離不

75 錢汝平:《楊璉真伽發陵與宋末越中遺民詩社》,《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頁81。

76 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頁45。

77 蘇天爵編:《元文類》,卷3,頁2。

78 李成文:《裂變與重生:宋元之際詩歌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年),頁252。

79 蘇天爵編:《元文類》,卷6,頁11。

開舊事已去，一切無從挽回之意。末處“歸來親舊”一語也是指向事件已經告一段落，餘下的只有無盡夕陽下的禾黍。如此，宋室亡國已成定局，遺民縱然能夠自守原則，卻只會擺出消極而失敗的姿態。這與林景熙生平中的積極行爲，包括挑戰元室權威、組建詩社以壯大遺民聲勢等，似乎不同，難以扣連其在遺民中的領袖位置。透過《元文類》編選兩位抵抗者所賦的方法，蘇天爵在恪守元室正統的前提下，其對金、宋遺民作品的收編呈現出清晰趨勢。

本來，遺民賦詩往往旨在延續故國文化的主體性，使其不至於消失於新的世代裏，並以此形成故國猶在的心理慰藉。在元代，隨著大量遺民詩社組成，這類詩歌更成為針對元室的“文化抗衡”(Cultural Resistance)手段，進而提升至“政治抗衡”(Political Resistance)的層次，意在抗拒國變的現實與元室的統治權威。<sup>80</sup> 而蘇天爵站在元室的立場，試圖把這些遺民詩收入“國朝”名下，使之融入“元詩”的主體性當中，令元詩發展的來龍去脈得以完整。蘇天爵與宋、金遺民各自對主體性的渴求產生了張力，而前者素來對史學和史料的堅持，又促使他不得忽略這一確實存在的問題。在這種處境下，《元文類》沒有排除遺民詩人的存在，但在選詩時顯然經過小心的操作。意即這些詩歌可以回憶故國，表達懷念和傷感，卻不會涉及直接書寫蒙古軍隊作為征服者的形象和行爲，更不會存有出於對前朝忠義的指控。詩歌所反映的遺民詩人形象亦是剝去了其作為抵抗者的姿態，餘下在時代洪流下的消極與傷心。結果，透過蘇天爵對“遺民”含義的如此詮釋，失去對抗意識，無異於自憐自傷的遺民詩得以進入《元文類》的詩歌行列，以為數不多之勢，在元詩大盛前的起始階段貢獻價值，進入“國朝”代表的主體性。“政治場域”的原則與“文學場域”的論述亦得以調和。正如前文的注釋提到，從現存的版本可見，《元文類》曾在官府主持的西湖書院刊行，意味著這部總集代表了官方的價值觀。<sup>81</sup> 其於文化層面上對遺民詩

80 關於宋遺民的“文化抗衡”手段，詳見拙文：《忠憤與抗衡——元代總集中的宋遺民情感》，《東海中文學報》第39期（2020年6月），頁151—192。

81 根據林申清的描述，現存《國朝文類》西湖書院至正二年刊本中，正文前有浙江儒學提舉移文，詳述刊書一事的始末，日期標示為“至正二年二月”。這進一步透露了官方對此書的認同和參與。詳見林申清編著：《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頁76。

人及其作品的收編由此表現出來。

## 五、結 語

蘇天爵在《元文類》中編選詩歌始於“國初，述至元、大德”。這個決定於元代詩歌史而言有其重要意義。在此可先引述今人鄧紹基在《元代文學史》的說法。其於書中就元詩的整體面貌描述如下：

元詩的發展以仁宗延祐年間為界，可分作前後兩期，延祐以前宗唐得古詩風由興起到旺盛，延祐以後宗唐得古潮流繼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後期的成就超過了前期。<sup>82</sup>

即使蘇天爵定下的範圍未及延祐年間，但從元初到元仁宗大德年間，其實已在這“前期”部分中佔相當大的位置。是以《元文類》收錄的詩歌作品其實大致上呈現了元代的前半段詩歌史。蘇天爵對詩文發展的觸覺可謂出色、準確。不過，鄧紹基以“宗唐得古”來概括這段時期的發展，則未免過於片面。固然，虞集、馬祖常、趙孟頫、劉因等大量出現於總集中的詩人，真的有著這種傾向，故蘇天爵沒有否認這是相當顯著的風氣。只是在此以外，亦不宜忽略這段時期對宋、金兩代詩風的接受。從詩學延續發展的常理而言，兩代詩風不單不可能與元詩毫無交雜，兩代詩人更是在元初時繼續活動，對詩壇發揮影響力，即蘇天爵所謂“踵金宋餘習”。如何安排《元文類》選歌部分的開端，成為了蘇天爵無從迴避的問題。

蘇天爵以“國朝”為書名，旨在為元代詩文建立主體性，使之與過去有名的“唐文”、“宋文”等文統概念鼎足而立，以一代文化的雄姿光耀後世。問題在於，在處理前代與元代的詩歌史交接期時，這個政治意味濃厚的目的難免遇上障礙。畢竟前代詩歌在入元以後還是延續亡國以前的發展，意即擁有自身的

---

<sup>82</sup> 鄧紹基：《元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頁370。

主體性，不會理所當然地成為“元詩”的一部分。況且，就內容而言，入元後的詩人總會保留前朝記憶，書寫中或多或少與元代的正統地位有所衝突。為此，蘇天爵花了不少心思於編選工作中。例如，他順應自身與北方學術的師承淵源，加上蒙古先滅金而後滅宋的有利歷史條件，合情合理地在宋、金之間判定後者為前朝的唯一文化正統。如是者，以元好問為首的詩人成為諸類的開端，南宋詩風的位置隨之遭到淡化。本來，蒙古入主之漫長過程導致三代文化交雜不清，但在蘇天爵的呈現下，有關脈絡有所簡化，文統的承接顯得清晰而單一；他又重視降元者之作多於遺民之作，即利用這些主動融入元朝正統者確保了元詩的主體性；就算無法完全迴避前朝遺民的存在，他亦藉由小心的選取過程，把遺民詩的內容嚴格限於懷念、哀傷的情感當中，同時抽去個人對故國的忠義、激憤，還有對元朝的抵抗意識。如是者，《元文類》為“元詩”覓得最恰當的開端。

固然，論元人對金、宋文化的接受情況，詩學一闕顯然只是其中一個範疇。以蘇天爵的個案而言，亦可在詩歌一類以外，進一步把整部《元文類》的 34 類文體都納入考察範圍。事實上，以元好問之作為首的情況，其實不只見於詩歌一類。如同本文注釋提到，另有七類屬於非韻文的文體均視之為開端，其中“題跋”一類更是始於其《跋金國名公書》，毫不諱言金代之文化。由此可見，蘇天爵對元好問的接受與重視遠遠超出詩學的層面。惟另一方面，在某些與政體、國統或朝事關係較密的文體，如冊文、制、表等等，又確實傾向以元代文臣為重心，鮮見遺民以至在野者的位置。這又反映出蘇天爵亦非全然樂意以金、宋兩代連結元代的文章與文化。箇中規律與關鍵，相信仍有再加討論與延伸的可能性。

（作者：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丁福保編：《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元好問著，張靜校注：《中州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文師華：《金元詩學理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 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年。
-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
-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李成文：《裂變與重生：宋元之際詩歌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年。
- 林申清編著：《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
- 林景熙著，章祖程注，陳增傑補注：《林景熙集補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 邱江寧：《元代館閣文人活動繫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 金開誠、葛兆光：《古詩文要籍叙錄》。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金履祥輯：《濂洛風雅》。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 查洪德：《理學背景下的元代文論與詩文》。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徐子方：《元代文人心態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
-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中國文學史》。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1986年。
- 楊鐮：《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
- 虞集著，王頌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

趙汭：《東山存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鄧紹基：《元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年。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錢泰吉著，昌彼德句讀：《甘泉鄉人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年。

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

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蘇天爵編：《元文類》。臺北：世界書局，1962 年。

Jennifer W. Jay, *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tism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Washington: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1.

## 二、論文

宋德金：《劉祈與〈歸潛志〉》，《史學月刊》1982 年第 3 期，頁 24—29。

周雪根：《〈國朝文類〉研究芻議》，《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4 期，頁 77—81。

范先立：《蘇天爵〈元文類〉研究》，開封：河南大學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年。

凌頌榮：《忠憤與抗衡——元代總集中的宋遺民情感》，《東海中文學報》第 39 期（2020 年 6 月），頁 151—192。

閻盟：《論蘇天爵的文學思想》，天津：河北大學文學碩士論文，2014 年。

陳漢文：《蘇天爵的〈元文類〉與元代中後期的大都文壇》，《人文中國學報》2015 年第 21 期，頁 291—329。

穆德全：《元代石家莊史學家蘇天爵在歷史文獻學上的貢獻》，《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4 年第 4 期，頁 48—57。

錢汝平：《楊璉真伽發陵與宋末越中遺民詩社》，《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9 年第 3 期，頁 80—83。

韓秀利：《談元代藏書家及藏書文化》，《東方人文學誌》2009 年第 1 期，頁 81—95。

顏智英：《末世孤臣的海戰詩比較析論：文天祥、張煌言》，《海洋文化學刊》2015 年第 18 期，頁 63—109。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in Randal Johnson, eds.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pp.29–30.

Hall Stuart,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in Samuel Raphael eds. London: Kegan-Routledge, 1981. pp.231–237.

## **Adopting the Old Practice of the Jin and So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Poetic History in Su Tianjue's *Yuan wen lei***

**LING, Chung W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 Tianjue (1294 – 1352) was a famous lead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iterati in the middle era of Mongol Yuan. Besides his proficiency in historiography, he also compiled a literary anthology titled *Yuan wen lei* (Yuan Literature Arranged by Genre), which has been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Yuan litera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oetic history shown in this book, especially the early part. Obviously, Su aimed to make Yuan poetry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is poetic history, but it would be unrealistic to deny the continuous cultural influence of the Jin and Song dynasties, which were both conquered by the Mongolians. This contradiction is highly related to how Yuan adopted the previous culture. This paper contains three parts. First, it introduces existing scholarship concern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Yuan and thereby studi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Yuan wen lei*. Secondly, it explores the position of Yuan Haowen (1190 – 1257) in the anthology and how Su selected the Jin poetry and included it in his anthology. Finally, it examines the poetry written by the loyalists of Jin and Yuan as a means to explore Su's attitudes towards these works.

**Keywords:** *Yuan wen lei*, Su Tianjue, Yuan poetry, poetic history anthology